

认知视角下的翻译思维与翻译教学研究

苗菊, 朱琳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天津 300071;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天津 300071 衡水学院 外国语学院 河北 衡水 053000)

摘要: 翻译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提高翻译思维能力,其前提是对翻译思维的研究认识。本文借鉴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思维心理学的理论成果对翻译思维过程的特征、翻译转换思维的类型、翻译思维的品质和结构进行分析和研究,并根据最新实证翻译研究的成果分析了翻译初学者和熟练译者翻译思维结构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翻译教学需要重点培养译者优化的思维习惯和监控思维能力,并提出教学建议作为具体教学实践的指导。

关键词: 认知视角; 翻译思维; 翻译教学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44(2010)01-0098-06

Abstract: A key objective of translation instruction is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translation thinking. To this end, the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thinking becomes a prerequisite. In light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psychology of thinking,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lation thinking process, the types of transfer thinking, and the qualities and structures of translation thinking. It then analyzes the structural differences in translation thinking between novice and expert translators. On this basis, it proposes that priority in translation instruction be given to cultivating the optimal thinking habit and monitoring thinking ability. Suggestions on translation instruction are also provided.

Key words: cognitive perspective; translation thinking; translation instruction

1. 引言

随着翻译学科的建立和翻译人才紧缺的社会现实日益凸显,翻译教学研究日益受到广大教师和学者的关注,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翻译教学体系的逐步完善促进了对翻译教学的层次细化研究,研究视角也从传统单一的经验性教学法研究,到多元的理论化选题,并开始关注翻译过程、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等。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翻译教学跨学科研究方面同语言学结合多,与其它学科,特别是心理学、教育学、认知科学等交叉研究少(郑晔、穆雷 2007: 61)。

根据笔者对近年来翻译教学研究的关注发现,一个共同的问题是,对学习者的关注力度不够,尤其是对学习者的认知特点和翻译思维过程缺乏足够的了解和研究。翻译过程同时也是译者复杂的思维过程(Shreve & Koby 2003: xi; Dimitrova 2005: 2; Neubert 1991: 25),而且“一个成熟和理想的译者,必定经历一个前期的思维训练阶段,而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已有的理性思维模式时刻影响着这一进程”(屠国元、李志奇 2007: 16)。

从思维发展心理学来看,教育是思维发展中的主导性因素,实践是思维发展的直接基础和源泉(朱智贤、林崇德 1986: 102)。所以译者的思维是在一定的教学环境里逐步优化的。思维能力的培养是教育的重要目标,发展思维能力和学习知识同样重要。前人关于翻译思维

的研究已有不少,归纳而言,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思维科学和翻译学结合的宏观考虑(方梦之 1992);2)从翻译过程的角度论述各种思维形式和特点(冯百才 1994);3)探讨语言思维差异并指导翻译实践(张光明 2001;王秉钦 1992;王玉章 2001);4)翻译教学中翻译思维能力的培养(安新奎 2001;温建平 2006;曾利沙 2006)。

尽管前三个方面联系翻译教学的论述很少,但其研究成果对翻译教学具有指导作用。第四方面现阶段只限于局部技术性的讨论,缺乏整体的指导理念和目标。笔者以为,各种层次的翻译教学尽管各具特点,但都不应忽视一个最基本的理念和目标,即在教学过程中思考如何提高学习者的翻译思维能力。提高翻译思维能力的途径是培养良好的思维习惯并形成监控思维能力,而对翻译思维的研究认识则是培养思维能力的前提。

2 翻译思维过程的特征分析

2.1 翻译的认知心理模型

思维属于认知活动。思维心理学认为,思维是认知活动的最高级形式,因为它包括了感觉、知觉和记忆等低级认知形式,同时又具备新的质,能完成低级认知形式所不能完成的任务:概括规律、推断未知(邵志芳 2007: 1)。现代思维心理学的主要流派包括格式塔学派(思维是“完形”的不断改组)、行为主义学派(思维是无声的语言,是

行为)、信息加工学派(思维是对信息的序列加工过程)和联结主义学派(思维是神经网络对信息的并行处理)。

近年来影响较大的是信息加工学派和联结主义学派,二者在认知心理学和思维心理学中都彰显出重要地位。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控制论、信息论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信息加工(information processing)范式成为研究人类认知的最好方法。因而从信息加工模式来思考翻译的认知或思维过程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思路。图1即为翻译过程的信息加工模型图(刘绍龙 2007: 7)。

图1中的双箭头表明了理解、生成与认知系统交互作用和影响的关系,长时记忆和工作记忆与表征之间存在同样的交互作用和影响(同上:4)。翻译过程的信息加工模型是一个以认知系统为依托的从理解到生成的转换和构建过程,其中转化和构建构成了翻译认知过程不同于一般认知过程的明显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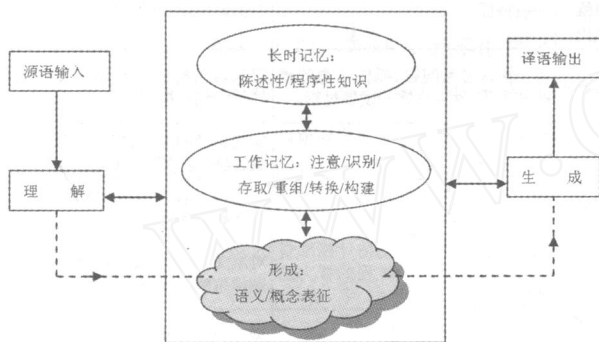


图1 翻译过程的信息加工模型

20世纪80年代中期,认知心理学的联结主义(connectionism)模式(又称人工神经网络)盛行。与信息加工模式关注信息的序列处理不同,联结主义模式强调语言信息的并行处理而非线性移动。联结主义神经网络模型共有三层神经单元群:输入层、隐含层和输出层。其结构可定义为拓扑的,其实质是确定神经元之间的互联结构(同上:10)。联结主义模式下的翻译认知过程如图2(同上:16)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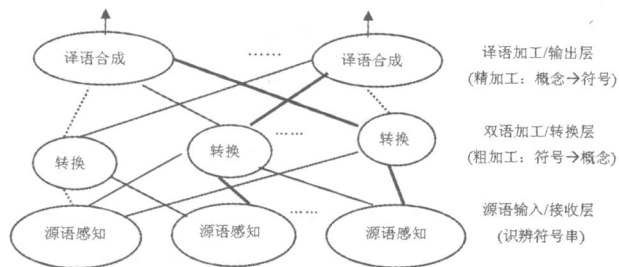


图2 翻译过程的神经网络功能模型(联结主义模型)

图2表明,翻译神经网络的层单元(输出层、转换层、接收层)构成了信息加工流程。但这种流程体现的是层级分工和层级交互同时作用的特点。三种不同的线条链接(虚线、细线、宽线)反映了单元层之间的链接权重由小到大的变化差异,表明层级间的单元既有兴奋性的链接,

又有抑制性的链接。另外,同一般联结主义神经网络模型一样,翻译过程的神经网络结构也表现出分布表征、并行加工和单元互补的特点(同上:17-19)。

2.2 翻译思维过程的特征

以上两种翻译认知心理模型作为两种不同的原型性理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翻译的思维过程。其实,国外一些学者如贝尔(Bell 1991: 81)的翻译过程模式、基拉里(Kiraly 1997: 156)的翻译过程的心理语言学模式,及丹克斯和格里芬(Danks & Griffin 1997: 174)的翻译过程模式和莫瑟尔(Moser-Mercer 1997: 180-81)的口译过程的信息处理模式可以看作是以上两种原型性理论模式的细化发展(包括了具体的操作细节)。分析翻译的思维过程可得出如下翻译思维特征:首先,翻译思维过程有一定的序列性。从源文信息的输入开始(源语感知),到复杂的转换过程(长时记忆、工作记忆、语义表征单向序列),再到译文语言的形成,经历了信息的序列处理过程。其次,翻译思维过程是不断反复的复杂思维过程。从理解(源语感知)到复杂的转换过程(长时记忆、工作记忆、语义表征双向序列),再到生成(译语合成)同时也是一个可逆过程,体现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同时进行的交互思维过程,尽管在不同阶段这个过程的发生并不均衡。国外已有学者(Buchwitz & Alves 2006)在实证研究中论证了翻译思维过程的反复性特征。此外,翻译思维在不同层级和单元交互作用的过程中,既有积极的作用(兴奋性的链接),亦有消极的作用(抑制性的链接)。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对两种普遍心理模型模仿而成的这两种翻译思维模式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即它难以清晰地反映出双语转换不同于单语信息处理的独特性。尽管两种模式都有转换一环,但图1并未明确是何种转换,图2只是认为是符号与概念之间的转换。事实上“概念”之说所指宽泛,对分析翻译思维益处不大。而翻译转换问题对翻译思维过程至关重要,会影响到对翻译思维本质的理解。

在翻译转换思维方面,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的格姆里奇(Gommlich 1997)谈到了译者翻译心理过程中同时存在与源语和译语相对应的两种不同的表现视角(representational perspective)。他认为,“表现视角是语言当中反应出来的文化状况”(同上:62),它“属于影响语言使用的文化情境中的一组基本因素,它和文本产生的基本认知过程紧密交织在一起”(同上:65-66)。因此,“表现视角”实际上是指影响语言表达特点的文化情境及与之相连的思维方式。他还认为,译者需要具备从语言L1到L2的典型的表现视角转换能力(同上:67)。这表明,翻译所涉及的不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同时也是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转换,而不同的思维方式是与特定的文化情境分不开的。

事实上,语言、文化与思维的密切相关性已经表明,与特定文化情境密切相关的思维方式、特征和风格上的差

异,成为语言差异的深层次、最具有支配性的初始因素。翻译转换过程表层是不同语言的转换,深层的心理机制则是不同思维方式的转换。因而,与单语信息处理的思维过程不同,翻译思维过程最重要的特点乃是双语交互思维。

综上所述,翻译思维过程的基本特点表现为思维的序列性、反复性、神经单元交互影响性及双语交互思维性。

3 翻译思维的类型和译者的思维品质

3.1 翻译思维的类型

国内学者如黄忠廉(2000: 4)、王宏印(2002: 124-29)、刘宓庆(2005: 92)、曾利沙(2006: 184)、徐丽娜(2006: 6)、温建平(2006: 9-10)等在翻译思维类型方面有探讨,如抽象思维、形象思维、直觉思维、监测思维、预设思维、创造性思维等,这些思维属于普遍思维类型。翻译思维不但具有普遍类型特征,而且具有不同于一般思维的独特性。

翻译思维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是一种转换思维,各种思维形态始终围绕“转换”这一中心问题展开。德国学者库斯莫尔(Kussmaul 1995: 52)对翻译转换中的创造性心理进行探讨,他认为创造性心理在翻译转换过程中并不是少数天才头脑的专利,而是一种普遍的思维特征。而且库斯莫尔(Kussmaul 2000)借鉴认知语言学的图形背景(figure-ground)、场景框架(scene-frame)、原型和范畴(proto-type and category)等理论论述了创造性翻译转换过程的五种心理类型,包括:范畴链接、提炼场景要素(即场景替换框架)、扩展场景、框架替换场景、设计新框架。这五种心理类型亦即五种不同的转换思维类型,指译者在翻译转换时考虑如何使译文和原文对应的思维类型。此外,根据笔者的研究,翻译转化思维还有设计新场景、场景对应、框架对应三种类型。综合起来,将翻译转换思维类型的内容分析如下表所示(表1):

表 1. 翻译转换思维的类型及其内容

翻译转换思维类型	原文本和译文本的对应关系	简单举例
范畴链接	译文和原文的联系(因视角或焦点不同所致的差异)如整体脚本(scenario)中不同范畴的联系或如图形-背景之认知关联	《红楼梦》—The Story of the Stone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场景替换框架(框架-场景)	原文的抽象框架变为译文的具象场景	得意忘形 - have one's nose in the air come straight to the point - 开门见山
框架替换场景(场景-框架)	原文的具体场景变为译文的抽象框架	reaping what he has sown - 咎由自取 快马加鞭 — speed up
设计新场景	译文改变原文的场景,创造新的场景	雨后春笋 — shoot up like mushroom bum one's bridge—破釜沉舟
设计新框架	译文改变原文的框架,创造新的框架	kiss—握手
场景扩展	译文对原文场景描写加入新的成分,扩展了场景范围	引狼入室 — set the wolf to keep the sheep
场景对应	原文场景对应译文场景不变	fish in the troubled water—混水摸鱼
框架对应	原文框架对应译文框架不变	熟能生巧 — practice makes perfect

翻译转换思维的多种类型表明,翻译过程中译者在寻求和原文不同程度对应的时候,由于社会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译者需要不同的转换思路。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揭示的翻译转换类型将语言和思维有机联系起来,有效解释了翻译语言转换的心理机制和思维类型。

3.2 译者的思维品质

思维类型体现出思维的普遍性特点,而思维品质则是思维个性差异的表现。思维品质是思维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培养思维、发展智力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口。思维心理学认为,思维品质主要包括思维的深刻性、灵活性、独创性、批判性和敏捷性(朱智贤、林崇德 1986: 584-94)。反映在具体的翻译活动上,各种思维品质亦具有具体的内涵(见表2)。

表 2 译者思维品质的特征及其在翻译活动中的体现

思维品质	一般特征	在翻译活动中的主要体现
深刻性	善于深入思考问题,抓住事物的规律和本质,预见事物的发展过程。	对双语结构特征和思维特征之差异的深刻把握。
灵活性	发散性思维特征,其实质是知识和策略的“迁移”。	发散思维的能力,多方提出翻译对策,灵活应对翻译问题。
独创性	独立思考创造出有社会或个人价值的具有新颖性成分的智力品质。	综合运用各种翻译策略和知识创造性翻译的能力。
批判性	思维过程中善于严格估计思维材料和精细检查思维过程的智力品质。	对原文不同层级的细致分析和对翻译策略的精挑细选。
敏捷性	思维过程的迅速程度。	翻译思维过程的流畅程度(flucuity of thinking)、翻译决策的迅速程度。

对翻译思维类型和译者思维品质的清晰了解为我们下一步在翻译教学中培养译者良好的思维品质明确了方向。

4 翻译初学者和成功译者思维结构的差异

4.1 译者思维结构的内容

思维心理学认为,思维结构由以下六个因素组成:1)思维的目的;2)思维的过程;3)思维的材料或结果;4)思维的监控或自我调节;5)思维的品质;6)思维中的认知因素与非认知因素。作为具体的思维活动,翻译思维的结构也可以此为参照来分析研究其独特的内容(见表3)

表 3 译者的思维结构分析

一般思维的结构	内容	译者的思维结构的内容
目的	理解、解决问题	理解(原文)、转换(思维模式和语言符号)、生成(译文)
过程	基本过程:分析和综合(派生过程:抽象和概括、比较和分类、系统化和具体化)	对原语和译语文本(词语形态、语法层次、文体修辞、词义色彩)、语境(上下文情境、文化语境)的分析与综合、对转换策略的分析与综合
材料	感性材料(感觉、知觉、表象) 理性材料(概念、判断、推理)	作品世界:语言表象、表达程序、事理意象;主观世界:语义范型、人格结构、现象图式;客观世界:符号系统、文化观念、现实事物(王宏印 2002: 110)
结果	概念、判断、推理	产生译文的事理意象、表达程序、语言表象

监控或自我调节	元认知功能:定向、控制、调节	监控自己理解原文和生成译文的过程并及时锁定问题,从而调整和优化翻译策略
非认知因素	动机、兴趣、情感、意志、性格等	翻译动机、兴趣、情感、意志、性格等

表 3 对译者思维结构的细致分析,可以使学生和翻译教师对译者的思维结构形成清晰的了解,对培养学生的元认知能力和监测思维能力奠定思想基础。

4.2 实证研究揭示出的思维结构差异

对初学者和熟练译者思维结构差异的进一步了解,会使翻译学习和教学具有针对性。在思维结构的几方面中,最难了解的是思维过程。为此要借助当代实证翻译研究的最新成果。从 80 年代中期至今,当代实证翻译研究借助实验心理学研究方法和现代电脑软件技术(如有声思维法—TAPs、电脑操作记录软件—Translog 和屏幕录像软件—Camtasia Recorder),对译者大脑“黑匣子”的不断探知,为我们了解翻译初学者和成功译者的思维过程的差异打开了一扇窗。

最新研究成果如巴西米纳斯联邦大学的阿尔维斯和欧普鲁雷图联邦大学的冈萨尔维斯(Alves & Gonçalves 2007)在关联理论和联结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对翻译初学者和熟练译者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建立了二者的翻译能力认知模型来表现其差异。他们发现熟练译者的认知特征:1)具有较强的元认知能力,能够将各层次的翻译任务和要求整合;2)将自己认知系统的边缘层次和中心层次相结合,从而充分发挥其认知系统的功能;3)综合利用程序性、概念性和语境性信息;4)对自己决策的自信。

初学者表现出的认知特征:1)元认知能力较差,难以有效驾驭并监控翻译任务和过程;2)语境信息利用不够,过分依赖词典意义;3)难以建立程序性、概念性和语境性信息相互联结的桥梁;4)源语和目的语之间互相干扰现象严重;5)在具体语境中对翻译单位的确定比较模糊;6)对自己的决策不自信。

阿尔维斯(Alves 2007: 73)在另一项实证研究也发现,与初学者相比,熟练译者的元认知能监控和评价译者的自己的(思维和行动)表现,并产生强化现有语境信息的元表征,从而能用较少的认知努力产生相关度较大的语境效果。

哥本哈根商学院的雅各布森(Jakobsen 2005)也通过实证研究调查熟练译者翻译过程中知识处理(processing knowledge)的思维过程。他根据有声思维实验发现,熟练译者在翻译之初会利用文本的主题知识确定知识范围,然后有条理地利用主题知识建立起解决模糊语义的语义场景。接下来,他们还能有效利用各种翻译资源,提出多种翻译策略并对其进行甄选(同上:179)。

另外,通过对翻译过程用时和停顿用时的监控发现,学生译者和熟练译者总体用时相差不大,但在用时分布上相差很大:与学生译者相比,熟练译者初稿阶段用时较少,修订阶段用时较多。翻译过程的开始阶段和最后修订阶

段用时都比学生译者要多很多。因为开始阶段熟练译者会有通观的考虑,而学生译者考虑较少;而且最后修订时的甄选思维过程要比学生复杂得多。

迄今为止,西方学者关于翻译过程(包括口译和笔译)的实证翻译研究方兴未艾,研究内容除翻译初学者和熟练译者的认知差异之外,还有关于专业译者认知能力、翻译策略的研究(Shreve 2006; Ericsson 2002)和关于学生在专业培训后的翻译能力发展情况的调查研究(Séguinot 1991)等。这些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到翻译初学者和熟练译者的认知思维过程和翻译策略的差异。另外,熟练译者翻译思维结构的非智力因素方面的特征,除了以上提到的自信心外,熟练译者还表现出一定的敬业精神,如对翻译问题锲而不舍的求索、对原文和译文读者的伦理责任等,这些认识为翻译教学指明了方向。

5. 翻译教学中培养译者良好的思维习惯和监控思维能力

每个学生都是思维的独特个体,他们的思维特点既有共性,亦有个性。在翻译教学之初,应该对学生的翻译思维特点有一定的了解。教师可以借鉴实证翻译研究的方法,结合前面对翻译思维品质和思维结构的研究,自己设计问卷或开展实验研究,对学生翻译思维进行调查研究和描写分析,总结其特点,找出问题,使翻译教学设计具有针对性。

对翻译思维过程、翻译转换思维的类型、翻译思维的品质和结构等问题的研究,能对翻译教学中培养译者思维能力起到有效的理论指导作用。翻译教学中培养译者思维能力的主要目标是培养译者良好的思维习惯和优秀的思维品质,并逐渐培养监控思维能力。

5.1 翻译思维过程的特征指导良好思维习惯的培养

培养良好的翻译思维习惯,主要是指培养译者优化的翻译思维过程和优秀的翻译思维品质。翻译思维过程的基本特征为:思维的序列性和反复性,神经单元交互影响性和双语(交互)思维性。

思维的序列性启发我们,在翻译教学中培养学生按照翻译思维序列的规律去思考,如学习熟练译者如何在翻译开始阶段对翻译活动进行通观考虑(如对主题范围、文本类型、委托人要求、译文读者期待、译文与原文的关系等的综合考量);学习他们如何在翻译的理解、转换和生成三个环节优化思维模式等(如三个环节的相互关联思维、翻译转换时优先考虑的因素,避免语言之间的相互干扰等)。

思维的反复性决定了在翻译教学中要培养学生在原文和译文(语言、结构、文体风格等)、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之间反复进行比较斟酌,确定最佳的翻译方法,并使学生在这种反复思考中深刻体会翻译思维的复杂性,提高思维的深刻性和批判性品质。

思维的神经网络交互影响性表明翻译思维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综合思维过程,要求译者综合考虑程序性、陈述性知识和语境信息,调动各种思维形态来形成翻译策略,培养学生思维的独创性。同时,教师要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预测翻译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引导学生形成积极的神经网络联系(如对两种语言、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对比联系,了解其异同),避免其消极的方面(避免不同语言结构、思维方式的负迁移)。

翻译思维的双语(交互)思维性也决定了翻译教学中要重点关注双语语言、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对比研究和学习,使学生对这些差异了然于胸,才能在翻译转换时达到思维的灵活性和敏捷性。

5.2 对翻译思维的认识指导监控思维能力的培养

译者对翻译思维的品质、类型、结构等形成清晰的认识,是翻译教学和译者自我提高的重要基础。前面论述的翻译转换思维的类型、翻译思维的结构和品质等知识能够使译者形成对翻译思维的元认知,从而在翻译过程中自觉调整自己的思路,逐渐形成监控思维能力,这是翻译能力提高的根本途径。

翻译转换思维的八种类型启发我们,在翻译教学中,不能只强调翻译对等,而要让学理解对等概念的复杂性不是简单的字当句对可以涵盖的。教师应该精选典型翻译实例,将翻译转换思维的各种类型融入其中,使学生在翻译练习中得到体会,逐渐强化思维转换能力。

翻译思维的结构分析和翻译初学者同熟练译者思维结构的差异,说明在翻译教学中应该让学生重点了解翻译思维结构中的材料、过程、结果、元认知特点等内容,以及和熟练译者之间的思维结构差异,并以此指导自己的思维发展过程,更有针对性地进行思维培养。

在教学研究中,柯林娜(Colina 2003: 5)认为,建立在研究基础上的教学法是必须的和可行的。翻译研究将理论翻译研究和描述翻译研究的成果转化成翻译教学的原则和方法论,然后使教学人员利用这些原则和方法论去创造具体的教学法。因此,在翻译思维能力培养方面,翻译教师和教学研究人员可以整合对翻译思维过程起指导作用的理论,使译者从宏观上指导翻译的思维过程。如德国功能学派的翻译理论,注重翻译目的和译本的功能,分析不同文本类型的功能,其文献性翻译(documentary translation)和工具性翻译(instrumental translation)之分类以及在不同的翻译类型、翻译目的和翻译过程的侧重点之间相关联的思想(Nord 2001: 47-51),使学生在理解某一类翻译中首先思考的问题。

任何翻译理论都是对翻译活动的某一层、某一方面的认识和概括,有其特定适用范围的有效性,所以可以从各种理论中提炼出一定的思想方法,从而有利于形成对翻译思维过程的元认知监控和思路调整。

6 结语

本文借鉴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思维心理学的理论成果,对翻译思维过程的特征、翻译转换思维的类型、翻译思维的结构和品质及翻译初学者和熟练译者思维结构的差异等一系列翻译思维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述,从而为翻译教学中培养译者良好思维习惯和监控思维能力提供参考。

科学的思想需要化为具体的行动,翻译教学的具体实施,需要广大教师和学者设计有针对性的教学计划,创造各具特色的教学方法,如可以把翻译实证研究的有声思维法转化为教学方法,演示有声思维,供学生观摩和学习;也可以将思维心理学中关于思维训练的一些常用方法,如集思广益训练法、生疑提问训练法等贯彻到翻译教学的设计中去。要使学生对翻译思维的特点和自己思维方面的差距有清楚的认识;使学生以良好的思维习惯解决实际的翻译问题,这是两个重要的原则。

注释:

每一方面的研究这里只列举了有代表性的研究项目,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限于篇幅难以全部列出。

框架是认知语言学家 Charles Fillmore 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最早提出的概念,其后他本人对框架的认识有所变化,从最初的语言学内涵的定义[框架是和场景相关的一系列的语言选择(Fillmore 1975: 124)]转变为认知内涵的定义[框架即一种内在连贯的知识结构(Fillmore 1985: 223)]。Paul Kussmaul 在研究中借用了 Fillmore 场景框架语义学中的概念(1977),认为场景是在抽象框架基础上由语言描绘出的具体情景,而框架比场景抽象,用语言表征时用语更少(Kussmaul 2000: 120)。

限于篇幅,表中只用了一些简单的熟语翻译做例子,英汉、汉英翻译皆可。而在实际翻译当中,尤其是文学翻译中,在词汇、短语和句子甚至语段都可能发生类似的各种翻译思维类型,而且并不仅限于英汉互译。Kussmaul(2000)曾经举了一些英德翻译的例子。

表 3 中略去了“思维品质”和“认知因素”两项,因为“思维品质”的内容在前一节已有详述,而“认知因素”与此表中“过程”一项重复,故略去。

可以引导学生阅读翻译家的人物传记,了解其敬业精神和人格魅力,使学生得到思想上的陶冶和教育。

参考文献

- [1] Alves, F. & Gonçalves, J. Modelling translator's competence: Relevance and expertise under scrutiny[A]. In Y. Gambier, M. Shlesinger, & R. Stölze (eds). *Translation Studies: Doubts and Directions*[C].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7: 41-55.
- [2] Alves, F. Cognitive effort and contextual effect in translation: A relevance-theoretical approach[J].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2007(10/1): 57-76
- [3] Bell, R.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M]. London: Longman, 1991.
- [4] Buchweitz, A. & F. Alves. Cognitive adaptation in translation: An interface between language direction, time, and recursiveness in target text

- production[J]. *Letras de Hoje*, 2006(41/2): 241-272
- [5] Colina, S. *Translation Teaching: From Research to the Classroom: A Handbook for Teachers*[M]. Boston Burr Ridge: McGraw-Hill, 2003.
- [6] Danks, J. & J. Griffin.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A 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A]. In J. Danks et al(eds). *Cognitive Proces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C].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97: 161-175.
- [7] Dinitrova, B. *Expertise and Explicit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M].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 [8] Ericsson, K. Expertise in interpreting: An expert-performance perspective[J]. *Interpreting*, 2002(5/2): 187-220.
- [9] Fillmore, Charles. An alternative to checklist theories of meaning[A]. In C. Cogen, H. Thompson, G. Thurgood & K. Whistler (eds). *Proceedings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 [C].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975: 123-131.
- [10] Fillmore, Charles. Scenes-and-Frames Semantics[A]. In Zampolli, Antonio(ed). *Linguistic Structures Processing* [C].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1977: 55-58.
- [11] Fillmore, Charles. Frames and the semantics of understanding [J]. *Quaderni di Semantica*, 1985 (V D): 222-254.
- [12] Gommlich, K. Can translators learn two representational perspectives? [A]. In J. Danks et al(eds). *Cognitive Proces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C].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97: 57-76.
- [13] Jakobsen, A. Investigating expert translators' processing knowledge [A]. In Helle, V. et al(eds). *Knowledge Systems and Translation* [C]. The Hague: Mouton de Gruyter, 2005: 173-189.
- [14] Kiraly, A. Think-aboud protocol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professional translator self-concept[A]. In J. Danks et al(eds). *Cognitive Proces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C].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97: 137-160.
- [15] Kussmaul, P. *Training the Translator*[M].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5.
- [16] Kussmaul, P. Types of creative translating[A]. In A. Chesteman et al(eds). *Translation in Context*[C].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0: 117-126.
- [17] Moser-Merser, B. Beyond curiosity: Can interpreting research meet the challenge? [A]. In J. Danks et al(eds). *Cognitive Proces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C].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97: 176-195.
- [18] 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 Approaches Explained*[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19] Neubert, A. Models of translation [A]. In S. Tirkonnen-Condit (ed). *Empirical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C]. Tübingen: Narr, 1991: 17-26.
- [20] Seguinot, C. A study of studen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 In S. Tirkonnen-Condit (ed). *Empirical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C]. Tübingen: Narr, 1991: 79-88.
- [21] Shreve, G. The deliberate practice: Translation and expertise [J].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2006(91): 27-42.
- [22] Shreve, G. & Geoffrey K. What 's in the "Black Box"? Cognitive scienc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A]. In Joseph D. et al(eds). *Cognitive Proces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C].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97: xi-xviii.
- [23] 安新奎. 翻译教学与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J].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1(2): 71-74.
- [24] 方梦之. 思维科学与翻译学 [J]. 福建外语, 1992(1/2): 5-7.
- [25] 冯百才. 翻译与思维 [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4(4): 8-11.
- [26] 黄忠廉. 翻译本质论 [M]. 北京: 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0.
- [27] 刘宓庆. 新编当代翻译理论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 [28] 刘绍龙. 翻译心理学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 [29] 邵志芳. 思维心理学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 [30] 屠国元, 李志奇. 论译者的思维结构 [J]. 中国翻译, 2007(5): 16-21.
- [31] 王秉钦. 文化与翻译三论——论东西方思维方法差异及其翻译 [J]. 外语教学, 1992(4): 67-73.
- [32] 王宏印. 英汉翻译综合教程 [M].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33] 王玉章. 关于思维方式与翻译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1(3): 45-48.
- [34] 温建平. 论翻译思维能力的培养 [J]. 外语界, 2006(3): 7-13.
- [35] 徐丽娜. 翻译的形象思维过程探析 [J]. 上海科技翻译, 2004(1): 6-10.
- [36] 曾利沙. 翻译教学中的预设思维训练——兼论译者主体主观能动性的思维动因 [J]. 外国语言文学, 2006(3): 180-184.
- [37] 张光明. 英汉互译思维概论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 [38] 郑晔, 穆雷. 近50年中国翻译教学研究的发展与现状 [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07(5): 60-66.
- [39] 朱贤贤, 林崇德. 思维发展心理学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翻译能力研究——构建翻译教学模式的基础”的成果之一, 项目编号: 06JA740029.

作者简介: 苗菊,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翻译学。

朱琳,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 衡水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 研究方向: 翻译学。

收稿日期 2009-10-16
责任编辑 孙毅